

# 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对改革开放的启示

周治勇

(毕节学院经济管理系; 贵州 毕节 551700)

**摘要:** 改革开放作为改变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转型现象, 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古典社会学也产生于西方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与转型时期, 古典西方社会学理论与学说对当时社会转型与变迁的研究, 对分析与解释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定的启示。如迪尔凯姆对社会事实的观察原则和解释原则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社会变迁与转型进行的分析。

**关键词:** 改革开放; 社会事实; 集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 C91-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059(2009)09-0103-04

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战略决策以及相伴而来的改革开放极大程度地改变了中国, 无论是在社会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生活领域, 还是在其他领域, 这种变化都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改革开放, 可以说是一次中国融入世界, 世界接纳中国, 中国影响世界, 世界需要中国的成功转型与变迁。在这一进程中, 传统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被撬开, 呈发散性、多元性发展, 原有利益格局由单一型转向多样型, 社会结构由同质性转向异质性,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最为深刻广泛的一次时代脉动。

对于中国这一影响巨大、深远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 任何学科都没有放过参与思考的机会, 积极从自身学科视角进行探讨与研究。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都著书立说, 对这一社会转型和变迁过程进行剖析和评述, 社会学也不例外。

社会学能在19世纪的欧洲出现, 缘于当时欧洲社会的思想启蒙运动、政治大革命、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崛起, 也是西方世界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从乡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变迁的过程。当时的许多学科和思想家纷纷用“冷静的眼光”去观察, 用“锐利的手术刀”去剖析这一社会转型与变迁现象, 并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学说和思想, 调整与改良、激进与暴力并存。而“冷静的眼光”、“锐利的手术刀”中也有社会学, 可以说, 社会学之所以能“浮出水面”, 也正是当时急剧而骤然的社会政治经济变迁, 导致原有的社会关系、社会纽带撕裂, 社会秩序破坏, 而如何重塑社会秩序、修正社会关系、调整社会的运行机制, 成为摆在这些学科和思想家面前的重大问题。

社会学思维方式对当时社会转型与变迁以及社会问题的思考, 西方古典社会学家对社会转型与变迁以及社会问题的理论探索, 对于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 是有一定理论启示的, 本文试用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论来解析这一伟大的社会变迁与转型。

## 二

在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 他把社会现象称为“社会事实”, 根据他对社会事实一词的解释“一切行为方式, 无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 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

收稿日期: 2009-06-16

作者简介: 周治勇(1975—), 男, 贵州纳雍人, 毕节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07级在职研究生。研究方向: 应用社会学、社会学理论。

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定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sup>[1]34</sup>在界定社会事实这个概念后，他确立了观察社会事实的原则与分析解释社会事实的原则，所谓观察的原则就是要把社会事实当作物来考察，这是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论的基础和分析前提；对于解释社会事实的原则来说，他把其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社会事实必须根据别的社会事实来解释，即到前在于它的那些社会事实中去寻找；第二个层面则是对社会事实的完整解释必须包括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他说：“当我们试图解释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别研究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和它所具有的功能。”<sup>[1]111</sup>也就是说要对社会事实（社会现象）进行充分分析和解释，因果分析与功能分析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因果分析让我们理解为什么是此现象而非彼现象发生或起作用；而功能分析则会揭示我们思考的这个社会事实会对整个社会或社会的其他组成部分的运行带来什么结果，也可以这样说，这个社会事实会对社会或社会的其他构成有什么影响。而我们对改革开放的分析就是从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论的这些基本准则展开的。

### 三

在改革开放前夜的中国，对这一即将到来的转型与变迁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都在思考：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按下了18个手印，搞起生产责任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历史就是这样巧合，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在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严峻历史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走向了共同的道路。可以看出，改变自身生活与谋求国家发展具有一致性，都是对当时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桎梏着人们思想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反思与回应。一方面是国家探寻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渴求，而另一方面是社会中的个人谋求自身的生存，在改变生存面貌、寻求发展问题上无论高层还是底层都在思考和探索，都希望通过一场实践来证明。这一点不谋而合。但同时也说明当时社会的各方面矛盾突显，到了急需解决的地步，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亟待解决的地步，正如孔德所说“社会历史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其根本原因是全部社会现实的各部门的矛盾所引起的，它包括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和才智方面。”<sup>[2]27</sup>即实行改革开放是具有其客观性的，正是当时的客观原因决定了必须进行改革，这个客观原因包含了国际原因和国内原因，国际原因就是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困难和面临挑战，在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新材料开发、航空航天技术、生物工程为特征的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新工业革命的浪潮，正是抓住了新科技革命兴起的机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有了迅猛的发展，经济与社会得以快速发展；而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等方面的体制和机制僵化，而导致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停滞，出现严重的困难，远远的落在资本主义国家背后。国内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失误，使整个国家遭受严重挫折，国家落后，人民生活困难。陈云就曾尖锐地指出当时的情况，他说：“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sup>[3]</sup>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国家层面、集体层面与个人层面都迫切需要一种方式来改善这种面貌，而这个方式是什么？——就是实行改革开放。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两段话，高度概括了我们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改革是必由之路，为什么是当代中国命运的抉择；如果不改革开放，不可能发展中国，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其实质就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正如迪尔凯姆所说，“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之中去寻找”，“一种社会事实的功能应该永远到它与某一社会目的的关系之中去寻找”<sup>[1]125</sup>，当我们今天分析解释改革开放这一社会事实时，就需要从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中去寻找，即改革开放前夜的种种社会事实，这样我们就可以寻找到在当时发生改革开放这一社会事实的真实原因。从而实现对改革开放这个社会事实的因果分析（即历史分析）。当我们找到当时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的原因后，对于接下来分析改革开放这一社会事实的后果或叫“结果”、“功能”，帮助是很大的，因为这

种分析或解释符合了研究社会事实的次序，即因果分析的逻辑，这个因果逻辑的“因”是什么？就是国家落后，人们生活困难；而“果”是什么？其实就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社会协调发展。

针对“因”，为实现“果”，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场改革从四个城市（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建立经济特区开始，再到广大农村，然后在全国各个领域铺开，一场革命性的社会变迁与转型深刻的影响着当时的中国。可以说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对于这种变化的最好阐述就是改革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的转折：第一个伟大转折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第二个伟大转折是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社会转变；第三个伟大转折是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转向基本小康的社会转变，然后逐渐成为兴旺。这样的评价是恰如其分，毫不为过的。

在对社会事实的分析解释中，迪尔凯姆还告诉我们，“在解释社会现象时，我们应当尽量把促使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和它所实现的功能区别开来。我们使用‘功能’一词倾向于‘结果’或‘目标’之意，是因为社会现象的产生并不一定是为了引起有益的后果”。<sup>[4]</sup>迪尔凯姆的上述话语告诉我们，社会事实在它所实现的功能中，会产生有益的后果，也有可能引起无益的或其他的后果，比如“失范性后果”等等。用很形象的描述来指代无益的或其他的后果就是：把窗户打开，带来新鲜空气的同时，也会有苍蝇、蚊子飞进来。或者说，会产生其他的反常社会现象或病态社会现象。改革开放给中国还有全中国人带来的种种繁荣图景，这样的有益结果可以说举不胜数；我们也不需要去描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就与辉煌，因为那样的实例也有很多。我们关注的是改革开放使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为什么会出现集体意识淡漠、精神世界空虚、社会信任度下降、人们的社会责任感降低等等反常和病态现象的泛滥。以及如何积极干预和矫正这些病态现象更好地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

在迪尔凯姆对社会事实的分析中，他强调社会环境对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影响，他所说的社会内部环境是指“社会的性质不同成分结合后形成的整体”它包括形态学事实和生理学事实，前者的标志是“物质密度”（单位面积的人口数、交通网络、居住格局等），后者的标志是“动力密度”（即群体的精神凝聚力或称集体意识）。<sup>[2]44</sup>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迁与转型的影响下，中国的社会环境与三十年前有了很大的改变，无论是在“物质密度”方面还是在“动力密度”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变化，但这种变化中不仅仅有好的变化，还有社会急剧变迁所导致的欲望膨胀、行为偏差和社会混乱的失范问题的出现，如原有的社会关系遭到冲击、组织群体发生变化、人们的集体意识淡薄、精神世界空虚，出现信仰真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得不到认同等等，成为了严重影响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的因素。这些无序行为和失范现象对社会环境的破坏作用很大。而社会环境能否协调运行会影响到改革开放的后续发展，如果不注意消除与疏导，必然会对改革开放起到破坏性作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迪尔凯姆认为是由于社会整合不足或整合过度而引起的社会问题或社会混乱现象。改革开放前，我国处在劳动分化程度较低的社会，社会分工不发达，人与人的相似性、同质性强，对集体有较强的归属感，个人淹没在对集体的遵从中，个体在集体实践之外没有其他路径可选择，所以个体被社会强制性的整合在一起，整合度极高。改革开放后，社会进入较高劳动分化程度的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高度的分工与专门化为个人意识和个性发展提供了可能，集体意识遭到削弱，人们的异质性增强；同时分工也造成了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成为必然，导致出现社会整合不足现象。针对这些社会事实，如何消除呢？迪尔凯姆提出必须加强“集体意识”的培育。什么是“集体意识”呢？在迪尔凯姆看来，“集体意识”就是“一般社会成员共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是社会的象征，有着自己的特征、生存环境和发展方式”。按照他的分析，在机械团结社会中，以强烈的集体意识为社会基础，集体意识几乎笼罩着人们的全部，左右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在有机团结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专门化，社会的分化，每一个人都按照社会分工执行着某种专门的职能，人们的异质性增强，同质化减弱，强调人的个性发展，“集体意识”的作用也随之淡化，对人的约束力减弱。而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就是“集体意识”笼罩着所有的人，左右着人

们的全部生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经济建设进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化，人们的互动机会增多、流动性增加。社会与个人的同质化减弱，而异质化增强；“集体意识”的作用与功能遭到削弱；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为追求经济利益而越轨，“超越”道德的约束，无视法律的威信，钻法律的空子。比如腐败、以权谋私、政府的信任下降、干群关系紧张等等，也对“集体意识”的淡化起到推动作用。但并不是说在有机社会中就忽视“集体意识”，或者说“集体意识”就没有用了呢？其实不然。因为“集体意识”在有机社会中并没有消失，而是隐性化，虽然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减弱，但依然对社会的团结起着调节作用，只是这种作用更注重社会的功能性及其相互依赖性。“集体意识”的表现形式更加抽象化，集中在价值层面的一致性上。即“由更一般、更模糊的思维和情感的方式构成”，也就是说在有机社会中把个体维系起来的纽带，已经不是原来机械性的同质化纽带，而是有机性的异质化纽带，这种纽带注重道德特性和共同意识的培养。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由社会发展中的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精细化决定的。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经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原有的“集体意识”在这一过程中被淡化和弱化，对整个社会的整合作用渐弱，所以就必须要重新建构适合这个社会的“集体意识”，来维系社会发展。在建构过程中，必须注意建构的现实条件，由于原有的集体意识的根基削弱了，社会成员间所共同拥有的东西减少了，人们的异质化增大，集体意识的内容逐渐变得抽象与规范，它不再主要依靠风俗习惯和禁忌、强制性措施，其功能也不再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控制和调节，而是强调一些普遍和抽象的原则，比如，公平、正义、诚实、规则。所以要少一些强制和极端，多一些对人性与人道的尊重。集体意识必须给个人意识留出空间，使整体的个性与部分的个性都得到发展，社会才能够真正实现有机团结。同时还必须要考虑到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心理需要、不同阶层的心理需要、整个社会的和谐心理建构以及本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1] (法) 迪尔凯姆.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M]. 耿玉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2] 侯均生. 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 [3] 陈云. 陈云文选·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250.
- [4] 乔森纳·H·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M]. 邱泽奇, 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26.

### **An Enlightenment to Reform and Opening – up by Sociological Method of Durkheim**

ZHOU Zhi – yong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Bijie University, Bijie, Guizhou551700, China)

**Abstract:** Reform and opening – up, as the phenomenon of change and transition for changing Chinese society, take the great influence. The classical sociology appears in a period of great change and transition for Western society, and the classical Western sociological theory makes the study at social change and transition of that time, having a certain enlightenment to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for reform and opening – up of China. For example, the analysis to social change and transition for reform and opening – up of China by observing and explaining principles for social facts of Durkheim.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 up; Social Fact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Unity

(责编:谭本龙 责校:张永光)